

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

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以其鲜明的政治话语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使译论界进一步发现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所存在的盲点和误区, 它为反思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语言的本质以及翻译的伦理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虽然纠正了传统译论的不少缺点, 但它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 从而引起了译论界的不少批判。

关键词: 女性主义; 贡献; 局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04)04-0020-06

On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Zhang Jing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gave fresh impetus to the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its political discourse. It establishe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criticizing structuralism-based transl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 feminism; contributions; limitations

1. 引言

女性主义, 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 单从理论上说, 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后结构主义是一场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女性主义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理解翻译的复杂性, 从而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结构主义语境中去考察, 有利于我们发现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中所存在的盲点和误区。女性主义应用于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它为我们认识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可译性、文化差异、忠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拟以此文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以及它的局限性。

2. 翻译研究的性别化视角

翻译研究的性别化视角由来已久, 因为翻译与女性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欧洲, 从中世纪开始, 翻译一直是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由于长期被排斥在特权以外, 女性常把翻译作为公开表达的方式, 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 翻译仍然是女性学习写作的一种训练。翻译也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例如反奴隶制运动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密切相关。女性以翻译为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发展和文学传统的更新。在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现代主义伟大作品中,

有一半是女性翻译的。虽然说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在翻译史上的结合有着某种巧合, 但女性主义被引入翻译研究决非偶然。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用性别歧视的隐喻来描写翻译。译者与女人在他们各自的等级结构中历来居于被歧视的边缘地位: 译者是作者的“侍女”, 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奈达(Eugene Nida)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范式取代了语文学范式, 为人们带来了科学主义的翻译观, 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 虽然没有用性别歧视的隐喻来描写和解释翻译, 但实质上它的哲学思想认同于这种歧视翻译的性别化视角。刘云虹(2002: 55)认为, 人们把翻译比作“仆人的工作”, 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臣服于原作”, 努力“使自己变小”, 这种歧视译者和译作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所造成的”。

2.1 译作与原作的地位

根据《圣经》的传说, 上帝先创造了亚当, 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 世界上先有男人后有女人; 翻译也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 翻译的女性气质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女人”和“译者”同属于话语的边缘地位。原作对译作具有等级上的权威, 人们把这一概念与父权制联在一起, 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又有生产力的男性, 而译作却是低劣的和派生的女性。这种性别逻辑也催生了大量有关译作与原作的隐喻, “翻译最多就是音乐的‘回音’(echo), 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说, 音乐表演是低于作曲的。在当今美国的版权法中, 翻译和音乐表演都是派生的作品”(Chamberlain,

收稿日期: 2004-01-30

修改稿日期: 2004-05-11

2000: 315), 这样的翻译话语强调了翻译的次要性。在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关系上, 译作也因此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和派生的, 是“摹本”(copy)和“替代品”(replica), 即原作的一种低劣的版本。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上, 结构主义翻译观虽没有明确贬低译作的地位, 但它的哲学基础“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 过分强调原文的中心性”(吕俊, 2001: 9)。从本质上来看, 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与这些隐喻同出一辙: 原作是中心和主体, 而译作则是边缘和他者, 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为原作服务。

2.2 先验性的翻译伦理

在神学统治翻译理论的时代, 与其说“忠实”是翻译标准, 不如说它是不可置疑的翻译伦理, 因为伦理服务于特定的主流话语, 属于制度和道德范畴, 它规定了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也确立了翻译过程中的原作与译作权力关系。早在1540年, 翻译家多勒(Etienne Dolet)在他的论说文中, 提出了佳译的五大基本原则, 其中第三条原则认为译者不能严格地字对字翻译, “以免成为原作的奴隶”, 后来被基督教会判以火刑处死(Bassnett, 1990: 14)。1654年, 法国的修辞学家梅纳日(Gilles Ménage)为翻译杜撰了所谓的“les belles infidèles”, 即“不忠的美人”, 从而把翻译对原作的道德义务与译文文体和语言修辞对立起来, 作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而没有认识到“忠实”的相对性和翻译标准的多元性。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翻译的一元标准, 它对“忠实”的理解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 认为意义是客观的、普遍的和确定的;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性, 忽视了差异性, 其翻译观也“始终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 也始终是对同一性与一致性的追求”(吕俊, 2001: 9)。

2.3 翻译行为的透明性

“忠实”的翻译伦理假设了一个积极的原著和一个消极的译作, 主动的创作在先, 被动的模仿在后; 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指出, 结构主义语言学关照下的翻译观, 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抹杀译者的主体性之上的, 译者被视为是“一个仆人, 一只看不见的手, 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Godard, 1990: 91)。翻译被简单地等同于机械性的符号转换, 因为两种语言是异质同构的, 它们的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也是一一对应的。既然翻译行为是透明的和机械的, 那么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不必要的; 这种观点不仅排除了译者的操控, 也剥夺了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身份。翻译不是创造性的话语活动, 它只不过是一种“摹本”, 这种翻译观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对机器翻译的极力推崇。但是, 它没有考虑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低估了翻译的难度和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翻译行为的片面认识甚至误解, 导致了翻译理论对译作的歧视, 并进一步导致人们对整个翻译行业的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翻译观甚至造成了整个学术界对翻译的学科歧视。

3、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 颠覆将女性纳入社会底层和将翻译纳入文学附庸的哲学传统。为此, 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 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 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是平等的; 语言不仅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 而且强化了性别歧视; 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

3.1 差异: 不是贬低译作地位的理由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 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 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 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 中心是本原和本质, 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夏光, 2003: 96-97)。女性主义者认为, 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 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关系一样对立起来。女性主义认为, 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还是“差异”与平等的对立, 差异本身也是多方面的, 有生理差异、心理差异、社会差异和文化差异, 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种生理差异在父权制中被夸大了, 此外, 生理上差异与社会差异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传统译论中, 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差异也同样被夸大了, 以此为基础的翻译观虚构了译作的次要性。女权主义认为, 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 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体, 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该是一个连续体, 根据互文性理论,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 其他文本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特征存在这一文本之中, 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与继承的关系。翻译家帕茨(Octa Paz)把翻译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一方面,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 随着文本的大量涌现, 每一个文本与先前的文本略有不同: 它们都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每一个文本都有它的独特性, 同时也是另一个文本的译作。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原作, 因为语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翻译, 首先是对非言语世界的翻译, 其次是每一个符号和每一个短语都是对另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短语的翻译。(Bassnett, 1990: 12, 笔者译)

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说明,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似的文本, 也没有完全不同的文本; 原作也不是绝对的“原创”(original), 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主观意识的标记, 因此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为了进一步颠覆原作对译作的霸权, 强调译作与原作在地位上的平等, 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走到了一起, 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 也没有背叛原作, 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也没有诋毁原作的纯洁性, 而是给文本输入新的血液, 引起另一个语言世界读

者的注意。因为,翻译“建立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联系,使那些因为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而隔离的国家互相沟通,使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传统的联系起来”(Steiner, 1975: 247),换言之,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丝毫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为此,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必须对文本作精心地选择,向原作“移情”(empathy),从而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sympathetic bond),并通过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形成“共生”(symbiosis)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这种关系之中的原作与译作,不再作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Bassnett, 1990: 11)。因此,原作与译作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因为它所追求的是双方的“互动”(interaction)和“亲密感”(affection),而不是“控制”。译作的存在不再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它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的统一。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建立在“爱情”(love)而不是“权力”(power)的基础上。双方试图在爱的追求中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存,达到合二为一但又不失去自我的状态。女性主义承认甚至肯定差异,把差异看作是对同一性的否定,因为差异不应该导致对立和排斥,而应该体现并存和包容。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3.2 语言: 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之场

翻译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于长期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语言被视为一个客观的(objective)和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这种翻译观建立在一种透明的诗学之上,把研究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并沿袭自然科学的研究传统,舍弃主观,追求完全中立的客观描述,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解释,可是一旦用来解释实际应用的语言(即言语)就会显示出许多缺点。

女性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忽视差异性,实质上掩盖了语言的性别歧视问题。女性主义的激进派指出,语言是造成女性被歧视的根本原因,而改良派认为,语言至少反映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对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性和作为媒介的物质性,女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者由此出发,认为性别歧视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她们认为,被男性垄断的语言本身已经成为男性经验的呈现,并形成一种语言规则。在这种规则中,男人具有普遍性和自主性,而女人只能相对而存在。尽管英语没有严格的语法性别,但是男性一般作为非标记(unmarked)形

式,成为普遍的能指,例如:

A student who pays **his** own way gets the tax credit. (*USA Today*, July 30, 1997, p.3B.)

A reverse mortgage can allow a senior citizen to remain in familiar surrounding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hicago Tribune*, July 29, 1996, Sec. 4, p1.)

语言学家艾里佳莉(Irigaray, 1994)认为,语言在构建男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不仅是意义生产的工具,还协调着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以男权为中心的语言不仅限制了女性经验的呈现,而且伤害了女性的自尊、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女性主义极力提倡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语言改造。1984年,美国一语言研究小组用语料库间断地调查了1971年至1979年的各种出版物,涵盖范围包括妇女杂志、议会记录、科学期刊以及新闻报刊,对用“Man”及其合成词指代所有人和用“He”及其曲折形式既指代男性又指代女性的现象进行调查,他们发现这一现象在每5000个单词中,1971年占12.3个单词,1979年下降到4.3个单词,该数据表明女性主义对语言的改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①。

翻译也是女性主义实施语言变革的重要手段。女性主义把对男权话语的拆解和对传统译论的解构结合起来,女性主义首先对语法性别(grammatical gender)提出了质疑,挑战以阳性为规范的语法。因为语法规则把阳性词置于阴性词之上,优先于阴性词。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突破了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不再把语言简单地视为一种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而是把语言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提出了语言“性别中性”(gender neutrality)的观点,主要目的就是公开反对语言的男性化,反对所有指称尽为男性表达方式。以《圣经》的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以致于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译者对语言的性别中性化虽然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霍吉路德(Joann Haugerud)等^②在《圣经》的翻译中拒绝使用“Man”或者“He”等词来包含女性,系统地运用各种手段实现语言的性别中性化,例如:

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who com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 and **he** who believes me shall never thirst... and **him** who comes to me I shall not cast out.”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f John* 6:35-37)

霍吉路德改译为:

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 **anyone** who com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 and **anyone** who believes me shall never thirst... and **those** who comes to me I shall not throw out.”

但是,女性主义译者并不满足于性别中性化的译本,因为语言的性别中性化是建立在两性同格的基础上的,例如,用“business executive”而不用“businessman”指代女性商人,用“firefighter”而不用“fireman”指代

女性消防队员,这样的译本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语言的性别中性化也会导致女性身份的遮蔽,更何况普通读者已经形成男权中心的思维习惯。因此女性主义译者进一步提倡在译本中使用两性兼顾的语言(inclusive language),这一主张在《圣经》的翻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两性兼顾的语言在《圣经》中又分为:平行性(horizontal)和垂直性(vertical)两种形式,前者指人际关系,后者指人与上帝的关系。199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UP)出版的《新约圣经》在考虑性别中性的同时,也注意语言的两性兼顾,在拉丁文版的第四节中“brother/brotheren”出现过21次,而在牛津版中译为“brother”只有1次,因为它指的是基督耶稣,译为“brothers and sisters”12次;译为“neighbor”2次;译为“them”或“those”3次;译为“all”1次;译为“relatives, friends, and benefactors”1次;而所有的“God the father”一律改译为“Our Father-Mother in heaven”^⑤。因此,女性主义关照下的语言不再是一个静止封闭的符号系统,它已经成为女性争取政治话语权的斗争之场。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操纵的工具”(Flotow, 1997: 8)。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强调语言的政治性,达到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目的。

3.3 重写:成为主体和重构伦理之策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性和观念而存在,它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而否定了主体因素的存在。以此为基础的翻译观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和“等值”,把它们作为标准甚至奉为伦理,用来评价和衡量一切翻译,其缺点就是遮蔽了译者的主体性,过于强调译者的“隐形”(invisibility),认为译者的参与对于原作和译作没有任何影响。建立在这种理念上的隐喻都使用了卑贱的术语描写译者,译者是“船夫”,其工作就是奔走于两种文化之间,搬运原作的内容;他们的工作就是“渡运”,因而也是短暂的。“忠实”的翻译伦理导致了译者主体身份的阙失,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要求界定翻译行为的主体,究竟是谁在翻译?为了张扬译者的主体意识,提出“翻译是写作的高级形式”(Levine, 1992: 79),激进的戈达尔德更为大胆地声称:“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而不是再生产”(Godard, 1990: 91)。对于“忠实”的理解,至少要考虑译者的主体身份及其能动性,因此“意义”也不只是永恒不变的存在,而是需要再创造的话语。女性主义翻译和写作在目标上是相同的,因为写作和翻译都在意义的生产中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性。女性主义译者首先肯定了其差异的合理性,把“女性驾驭”(womanhandling)作为莫大的快乐,突出自己对文本的操纵。

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

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例如,戈达尔德翻译女性主义作家布罗萨德(Nicole Brossard)的小说*L'Amèr*。Amèr包含了三种词义:mère (mother) 母亲;mer (sea)大海;amer (bitter) 辛酸。戈达尔德以文字游戏的形式传达了这三种词义,把三个词汇:“The Sea Our Mothers”(大海母亲)和“Sea (S)mothers”(大海溺爱者)以及“(S)our Mothers”(辛酸的母亲)组成一个围绕大写字母“S”的文字游戏,可以读成“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These Sour 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这是争议激烈的话题,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例如,女性主义译者莱文(Levine Jill)在翻译古巴和南美小说时,常碰到男权主义和厌女文化问题,她虽然声称译者无权改动原作的内容,也对她的改写在译文中公开道歉,但她还是对“父亲的”(father's)作品进行翻译的干预。哈伍德(Lotbiniere-Harwood)则更为激进,她拒绝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即使是翻译女性主义作者的著作也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和改动^⑥。

在理论上,为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重构新的翻译伦理,女性主义撇开了长期争论的“忠实”和“等值”等先验性的翻译伦理,否认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Flotow, 1997:96)。法国的翻译家和哲学家贝而曼(Antonie Berman)说:“每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翻译都基于一个方案,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一方案的确定取决于译者的立场和翻译的特定需求”(Berman, 1995: 76)。女性主义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反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功能主义观,翻译活动远不是消极地将原文的东西复制出来。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成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强调对文本有意识的干预,其实质就是要重新认识对译作的权威问题,究竟是谁翻译,为谁翻译?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说明,翻译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

4、女性主义译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特别是对权利关系的解释、对等级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肯定和支持,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走到了一起。女性主义自引入翻译理论以来,不断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日趋繁荣。女性主义对差异的解释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的霸权地位,为人们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文化差异、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语言的本质等问题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

目的,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也就不可避免地给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

首先,来自女性主义阵营外部的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党同伐异,其论点“过于情绪化、宗派化、理想化和主观化,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Levine, 1992: 77)。强调“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学者们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样,观点过于激进,过于强调译者对文本的干预和“重写”。例如,女性主义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对于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者来说,“忠实”的对象不再是作者或读者,而是“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Simon, 1996: 2)。这样的翻译标准如果运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可能助长滥译之风,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翻译行业的生存,因此女性主义译作也难以被出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长期居于学术界和译论研究的边缘。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对语言的操纵是不必要的,因为把性别歧视归因于语言是缺乏理论根据的。例如,按照女性主义的逻辑,难道“man-eating animals”、“man-slaughter”和“man-trap”之类的词语也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吗?此外,奈达就《圣经》的翻译中的语言的“性别中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大多数有生命的动物要么属于雄性,要么属于雌性;“性别中性缺乏有效的认知模式”,因为性别的生物性差异必须通过语言来认知和表达,这是语言所不能超越的;而且“两性兼顾的语言也不能解决性别中性所存在的问题”(Flotow, 1997: 78),例如,“androgyny”(雌雄同体)中指男性的部分“andro”以及“God the father and mother”中的“father”还是处于阴性词之前。

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方兴未艾,近年来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女性主义内部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女性主义译论本身的自我颠覆性。巴西女性批评家阿茹雅(Rosemary Arrojo)用三个术语综合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自我颠覆性(Arrojo, 1995: 67-75): 其一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声称“忠实”于原作的主旨(tenor),另一方面又提倡在翻译过程以女性的立场为基础对文本进行干涉和改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其二是“虚伪性”(hypocrisy),是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和对其他翻译理论的批判采取的是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例如,女性主义认为,斯坦纳(Gorge Steiner, 1975)提出的翻译阐释过程中的“侵入”(aggression)暗含了性暴力。但是她们自己也在使用“劫持”和“挪用”等词语描写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其攻击性较斯坦纳的“侵入”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三是“理论的非连贯性”(theoretical incoherence)。女性主义翻译话语不仅突出翻译的“颠覆性忠实”(subversive fidelity),而且参照了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并把理论批判建立在解构主义的某些论点之

上。阿茹雅认为,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否认意义的确定性,宣称意义是永远也无法“复制”(reproduce)和“恢复”(recover)的,但却经常被“创造”(created),“再创造”(recreated)和“更新”(anew)。那么,女性主义在翻译过程中声称意义的“再创造”和“更新”,从理论上来看是缺乏连贯性的。第二,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存在新殖民主义现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肯定“差异”的积极性,然而斯皮瓦克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对第三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过多的“挪用”和干预抹煞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并改变了她们的写作风格,其实质是“对非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构建”(Spivak, 1992: 179)。第三,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吉蓝(Robyn Gillam)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女性主义的翻译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类译文很少考虑广大女性的阅读能力,非精通双语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不能读懂。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结构主义之后新兴的理论范式,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它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不断更新和演进,新范式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旧的范式出现了危机,库恩(Thomas Kuhn, 1970)说:“检验范式总是在解决难题而引起危机以后才产生的”。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在被操控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女性主义成功地颠覆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但是,科学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ibid),我们在接受女性主义翻译观时,首要的是学习它的批判精神,抓住它的创造性实质而不是否定性、破坏性和颠覆性等表面特征,翻译研究不能停止于颠覆和破坏,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有它本身所不能克服的缺点和局限性,过分地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文本的“干预”,只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向极端。

5、结束语

在文化范畴内讨论翻译与性别的问题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女性主义给译学研究带来了不少启示。女性主义翻译观重视个体的兴趣和需要,承认个人的世界观、文化身份、历史语境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深入反思传统译论中的不合理性。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把研究的焦点转向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注意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并更深刻地认识到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为当今翻译的文化批评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使人们发现结构主义翻译观的不足。但是,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语言的差异性和政治性,也在批判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导致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我们的翻译研究,应该尽可能在一方面防止对语言规律的迷信和对主体意识的排斥,另一方面

克服对主体意识过分发挥的极端,并重视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提高译者的地位,才能有利于翻译学的建构。

注 释

- ① 参阅 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6-47.
- ② 参阅 L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p. 54.
- ③ 参阅 <http://www.adoremus.org/Transtoc.html>. K. D. Whitehead. The Inclusive Balancing Act Ideology Threatens to Topple True Translation.
- ④ 参阅 <http://aix1.uottawa.ca/~boedi048/FEMpaper.htm>. Feminist Translation.

参 考 文 献

- [1] 贺显斌. 翻译话语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浅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0): 40-42.
- [2] 葛校琴. 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 外语研究, 2003(6): 35-38.
- [3] 伽亚特里·斯皮瓦克. 翻译的政治[A]. 许宝强, 袁伟编译.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77-308.
- [4] 廖七一. 重写神话: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2): 106-09.
- [5] 刘云虹. 解释的合理性: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5): 55-57.
- [6] 吕俊. 结构·解构·建构[J]. 中国翻译, 2001(6): 8-11.
- [7] 荣维毅.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A]. 文池编. 思想的魅力[C].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 [8] 夏光.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9] Arrojo, Rosemary. Feminist, 'Orgasm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ntradiction[J]. *Tradeterm*, 1995, 2: 67-75.
- [10] Bassnett, Susan.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A]. Roman Al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 London: Cassell, 1990. 10-24.
- [11] Berman, Antoni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M]. Paris: Gallimard, 1995.
- [12]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A].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314-30.
- [13] 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 [14] Godard, Babara.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A].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Cassell, 1990. 87-96.
- [15] Irigaray, Luce. *Thinking the Difference: For a Peaceful Revolu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16] Kuhn, Thoma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7] Levine, Sunzanne Jill. Translation as Subversion: On Translating Infante's 'Inferno', Substance[A]. Lawrence Venuti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C]. London: Routledge, 1992. 78-85.
- [18] Maier, Carol.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Women's Fiction [J].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1998, 75: 95-108.
- [19]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20]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 Michèle Barret and Anne Philips (ed.).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C]. Cambridge: Polity, 1992. 177-200.
- [21]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作者简介] 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科研秘书, 讲师、硕士; 主要从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zhjinghua9064@sina.com

本 刊 稿 约

为规范本刊体例, 今后作者向本刊投稿请统一按照以下要求撰写。

一、本刊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 编辑部对来稿初审后, 以匿名方式转送专家审读, 每篇论文由两名以上专家评审, 以最终决定评审结果。

二、请在文稿前专页附上有关作者信息的内容, 包括: 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电话、作者电子信箱及作者简介(50字左右为宜)等; 论文正文内如涉及任何作者信息, 被视为无效投稿。

三、来稿希力求精炼, 论文一般以5000—8000字为宜, 长文应控制在10000字左右; 书评及人物介绍等应在5000字以内为宜。5000字以上的论述性文稿请附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和英文标题。如果需要, 本刊编辑有权酌情修改来稿。

四、文内所引文献要求夹注, 应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作者姓名(英文只注姓)、出版年和引文页码。例如(王佐良, 1982: 138)或(Newmark, 1988: 26-33)。文献详尽信息另在“参考文献”项下列出, 参考文献的标识体例参见本刊, 论文注释采用尾注形式。

五、请投稿者邮寄电脑打印稿一份和论文电子软盘一张, 本刊不受理电子邮件来稿。

六、请勿一稿两投并请自留底稿。本刊恕不退稿, 如三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 作者可自行处理文稿。来稿请寄至: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编辑部, 邮编: 100037。本刊不受理寄至个人的稿件。

七、对本刊所发表文章的任何转载, 须经本刊同意。

诚挚感谢译学界人多年来对本刊的厚爱与支持, 欢迎赐稿。